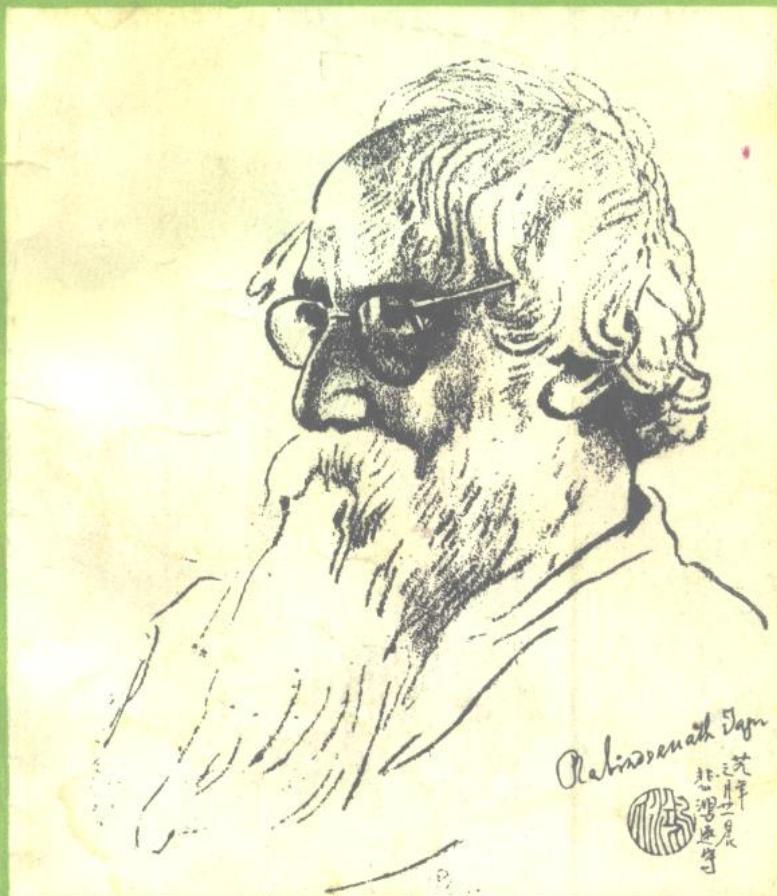


TAIGEER PINGZHUAN

# 泰戈尔评传

[印] S·C·圣笈多著 董红钧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泰戈尔评传

〔印〕S·C·圣笈多著

董红钧译

本书根据印度加尔各答 A.MUKHERJEE & CO., LTD.  
1948年版本译出。

### 泰戈尔评传

〔印〕S·C·圣笈多著  
董 红 钧 译  
责任编辑：唐荫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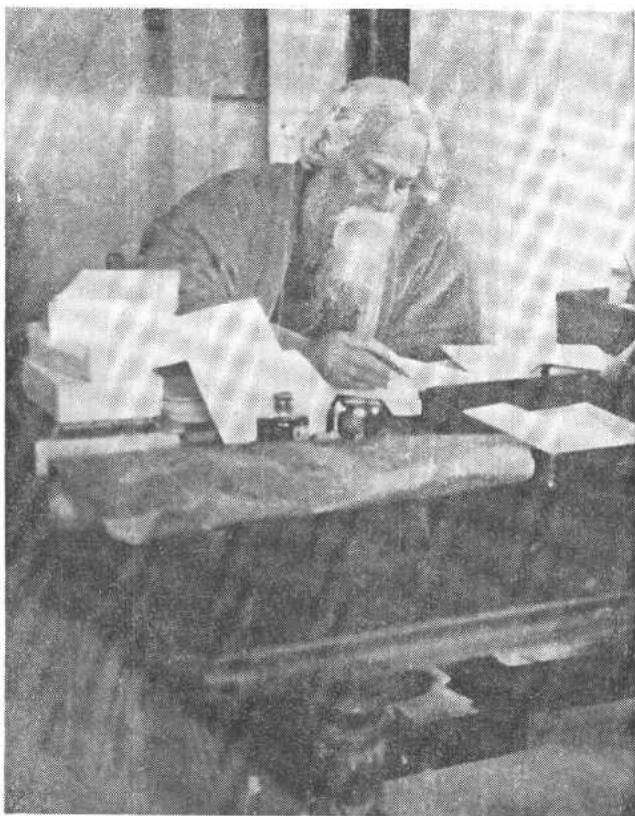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1,000 印张：7.75 印数：1—19,100  
统一书号：10109·1756 定价：0.91 元



Rabindranath Tagore

序言

第一章 罗宾德罗那特的生平

第二章 罗宾德罗那特的诗作

第三章 罗宾德罗那特的剧作

第四章 罗宾德罗那特的小说

第五章 罗宾德罗那特的其他作品

第六章 罗宾德罗那特的批评与理论

本书所选的文章，旨在批判地评价罗宾德罗那特在诗歌、戏剧和小说方面的作品。前两章是传记性的，但这儿的传记并不是详尽的，可能在细节的真实性上也并非是无可挑剔的。我的意图是评论而不是记传，因此我只是强调了诗人生活中的那些我以为对于评价他的作品比较重要的事件。

在评论的章节中，我一般局限于罗宾德罗那特作品的英译本上，虽然我也利用了我对于孟加拉文原版作品的理解，以使我的评论更加完善，由此产生的范围上的局限，将使此书更便于非孟加拉的读者阅读，而且我觉得对于孟加拉的读者也不无益处。罗宾德罗那特的大部分作品——几乎全部主要的诗歌、戏剧和小说——都被译成了英文。因此，我们在评论时必须有所选择，否则难免引起混乱。英文的翻译为我提供了一部极好的文集，我很高兴地利用了它。但愿我能再得到《乔赫—巴利》和《希谢尔—卡维泰》的译本以资借鉴。

我曾参考了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维斯瓦—比哈拉蒂》和《金船》的译本。必须承认，它们使我得益非浅。我对于其它作者的谢意也在书中他们被提及的地方一一作了说明。我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的老师斯里库玛·巴纳吉博士，他的著作和论述深刻地影响了我的评论。凡他所论述过的地方，我都不敢与之

有半点异议。塔拉帕达·穆赫吉教授和萨达南达·查卡拉瓦蒂教授审阅了我的初稿，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要是没有他们的修正，这本书一定会有更多的错误。本书又在多处蒙帕维德拉库玛·巴苏先生、塔拉克那特森教授和苏希尔库玛·锡德汉塔教授的指点。我谨向所有这些朋友，向穆赫吉公司尊敬的读者致以深切的谢意。至于本书的索引我得归功于我的堂兄 N·圣笈多的无私援助。

译者：李春生 梁甫生 赵培生 刘国平 陈其南

S·C·圣笈多 敬  
录于加尔各答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  
于加尔各答总统大学

译者注：本译文系根据原书第十一章“政治”部分的有关内容，由圣笈多先生根据他自己的理解，对原文进行的翻译。由于原文中有些地方的叙述不够确切，因此，在译文中，译者对原文的某些地方做了适当的修改，使译文更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在原文中，圣笈多先生把“政治”一词译为“政事”，而在译文中，译者将其译为“政治”。又如，在原文中，圣笈多先生把“政治”一词译为“政事”，而在译文中，译者将其译为“政治”。再如，在原文中，圣笈多先生把“政治”一词译为“政事”，而在译文中，译者将其译为“政治”。

译者注：本译文系根据原书第十一章“政治”部分的有关内容，由圣笈多先生根据他自己的理解，对原文进行的翻译。由于原文中有些地方的叙述不够确切，因此，在译文中，译者对原文的某些地方做了适当的修改，使译文更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在原文中，圣笈多先生把“政治”一词译为“政事”，而在译文中，译者将其译为“政治”。又如，在原文中，圣笈多先生把“政治”一词译为“政事”，而在译文中，译者将其译为“政治”。再如，在原文中，圣笈多先生把“政治”一词译为“政事”，而在译文中，译者将其译为“政治”。

## 目 录

绪 论.....	( 1 )
第一 章 诗人的成长.....	( 1 )
第二 章 实现.....	( 20 )
第三 章 思想和形象.....	( 42 )
第四 章 承古创新的神话.....	( 65 )
第五 章 爱之歌.....	( 82 )
第六 章 生命之歌.....	( 99 )
第七 章 与神一致.....	( 120 )
第八 章 戏剧——直接的和象征主义的(1) .....	( 142 )
第九 章 戏剧——直接的和象征主义的(2) .....	( 162 )
第十 章 短篇小说.....	( 183 )
第十一章 长篇小说.....	( 208 )
第十二章 结论.....	( 233 )
译后记.....	( 242 )

# 第一章

## 诗人的成长

### 1

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出生于加尔各答，他是特宾德罗那特最小的孩子。他父亲在许多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罗宾德罗那特自己说，“我难得见到父亲，他经常外出，但是他的存在依然影响着整个家庭，他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由于特宾德罗那特极其虔诚，在行为中严格地遵循道德准则，勇敢地提倡对于灵界神的崇拜（那意味着对盛行于印度的偶像崇拜的否认），他被大家称为摩赫希，即“大哲”。由于过多地谈论他多方面的活动会使我们偏离他儿子的传记，所以我们在这儿只强调这位大哲生活中的两个方面。在诗人出生的前五年，这位大哲放弃了一切世俗的寻求，他在经历了四处奔波之后，决定在西姆拉山区定居。那儿，他可以沉醉于宗教的冥想之中而摆脱尘世的纷扰和诱惑。在居住了大约两年以后，一天，他注意到一条美丽的山溪正涓涓地流向平原。这位大哲发觉，尽管山溪在下流的途中可能为尘埃所污染，它还是要通过滋润大地来完成它的使命。就在这条小溪的运动中，大

哲也看到了他生活的理想。离弃尘世生活而寻求的那种解脱，在他看来已经毫无价值了。他感到如果他曾领悟到过什么神妙的真理，那末他必须到现实生活中，到世俗斗争的旋涡中去实践它。他离别了山区，重新回到了世人中间，在尘世的活动中寻求永恒的幸福。就在这种通过束缚来寻求自由的活动中，我们预见到了一种罗宾德罗那特诗集中的最重要的思想。

大哲是一神论的信徒，那神他是从《奥义书》的教义中知道的，但是他不同意艾德维塔学派对这部经典所作的一元论的解释。艾德维塔派相信自身和神的绝对一致，但是大哲强烈地反对这种将自身淹没于绝对之中的哲学。他的传记作者艾吉库玛·查克拉瓦蒂指出了他的含有大量折衷主义成分的信仰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的。起先他认为，绝对是不同于自身意识的，正如自身意识不同于物质一样。而在论断这种不同时，他似乎又受到了笛卡儿哲学的影响。“我们不相信吠陀哲学，”他写道，

“因为沙姆克雷恰亚试图在其中证明梵和一切神所创造之物是同一和同样的。”后来他进一步明白了个体和绝对的关系，懂得了个体对于绝对的依赖性。作为一个神学家，在其思想体系的最终发展阶段，又有了进一步的突破。他说：“这个宇宙是绝对真理的产物。这个宇宙是相对真理，它的创造者则是真理的真理，即绝对真理。”在他的《论婆罗门法业》这本书中没有一处谈到“一元论”、“化身论”和“幻觉论”的学说。在大哲的信仰中，个体灵魂和神是互相分离的实体，他们就象朋友一样。然而，他们之间的差异又并非是不能克服的。神是最高的精神，世界则是其创造力自发外溢的产物。是神希望有一个世界，所以才产生了世界。这种对待世界和神的态度，带有毗湿奴的思想和宗教的色彩——因为早期的泰戈尔家族正是虔诚的毗湿

擎信徒——这种思想后来就发展成了罗宾德罗那特生活的哲学。\*

## 2

泰戈尔一家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的文化教养如何？泰戈尔家族在东印度公司于加尔各答经营期间作为商人和柴明达尔（地主）富裕起来。诗人的祖父，德瓦勒凯那特亲王，以其显赫的一生著称于世。他是婆罗门教的创始人，印度十九世纪第一个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人拉莫汉·雷的朋友。泰戈尔一家都是

\* 一个记者作了如下的评论：

“大哲的影响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了诗人天才的发展？我的感觉是，大哲以及他所代表的宗教，其清教徒和伦理的色彩都太浓厚了。这样的东西对任何一个崭露头角的诗人之感情的发展是不会产生有益的影响的。这种影响可能促成的最好的东西无非是《达玛桑吉塔》（宗教歌）中的诗篇而决不会是《吉檀迦利》或《吉蒂马尔亚》中的抒情诗。这后二部作品中的抒情诗是建立在诗人和绝对之间的神秘关系这样一种概念基础之上的，这在印度文学中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体现这种态度的精神在如下的诗句中得到了非常明确的阐述：

‘当东方欲晓时我遇到了你；那时阳光使黑暗骤变为黎明，波浪传递着两岸彼此的亲吻。’

你能否告诉我，诗人的这种感情来自何方？这显然不是婆罗门教的礼物，自然也不是大哲的遗产。我似乎感到《吉檀迦利》那神秘的心理决不是印度教中的任何东西所能解释的，更不能在印度教的影响中寻找出其蛛丝马迹。”

以上的评论尽管是引人注目的，却很难不受非议地令人接受。尽管大哲是位神学家，缺乏他儿子所具有的那种丰富的想象力，但毋容置疑，形成罗宾德罗那特诗集背景的那种哲学是植根于他父亲的教诲之中的。伊夫林·昂德希尔小姐说，“由于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的诗集是这种综合的神秘主义——一种对于神的无限的超然的和内在的真实之全面而冷静的态度的空前绝后的典范，由于其中所讲的是从生活本身出发，而不是从那种徒具庄严的名称实质上贫脊烦燥的所在出发，所以这种具有同样深度和广度的观念（它不同于极端的绝对主义和极端的内在论，它包罗宇宙，又不遗漏个体），正是支配他父亲一生直觉的东西。”

婆罗门，但正统的婆罗门却由于他们被称为“皮雷利”而排斥他们。关于“皮雷利”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各有各的说法，但据说是很久以前他们由于接触了穆斯林而受到了玷污。所以虽然他们还不属被驱逐者，但那些正统的婆罗门却把他们当作低种姓的人一样蔑视。泰戈尔一家在宗教观上是毗湿摩派，信奉素食主义；他们是开明的。曾经支持拉莫汉·雷进行社会变革的德瓦勒凯那特亲王曾访问过英国，并于一八四六年在那儿逝世。

就在这位亲王逝世十五年以后，他的举世闻名的孙子在加尔各答他们的乔拉圣科的小屋里诞生了。一次在中国的讲演中，罗宾德罗那特谈到了他所诞生的那个年代的重要性，并且谈到了在那些日子里，在轰动全国的三次革命运动中，他的家庭成员所发挥的作用。第一次运动是宗教的，其发起人是拉莫汉·雷，他向迷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并声称世界上只有一个神。前面已经提到，这一思想复兴运动的领袖之一，正是诗人的父亲大哲特宾德罗那特·泰戈尔。第二次运动发生在文艺领域，在这次运动中，贝金齐德拉把孟加拉文学从濒临衰亡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并以一种新的批判态度，使孟加拉的文学成为表达他们决不能忍受外族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清规戒律的强烈愿望的工具。第三次运动可被视为民族性的；它部分是政治的，部分又是文化的。“这是对于西方人经常凌辱我们的一种愤怒谴责。”它并不反对引进西方的思想，但它阻止不加区分地抛弃印度传统的文化和习俗。这次运动也反映在大哲的生活中。虽然印度许多人将他看得和基督徒一样坏，但是正是他比任何其它的同代人更重视对《奥义书》的研究，并且他丝毫不阻止在孟加拉改变对基督教信仰的潮流。关于他的儿子们，长子德威詹德罗那

特（1840——1926）在哲学和数学上造诣很深，曾在名为《梦幻的旅游》这篇作品中阐述了他的思想。次子萨特延德罗那特（1842——1923）是英国驻印度行政机构中第一个印度人，以他对于印度和欧洲文学的广博学识著称。另一个兄长乔蒂林德罗那特是个学问高深，多才多艺的人，关于他的情况将在后面详述。大哲的长女索达米尼是新创办的白求恩学校的最早的学员之一。

### 3

罗宾德罗那特就诞生在这种东方和西方的精神文明的气氛中，并在那间喧闹的，永远挤满那些不断地唱歌，写诗，讨论神学、哲学和文学问题的人们的乔拉圣科的小屋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他曾以其独特的笔调在《我的回忆》和《我的童年时代》中叙述了他的早期生活。在这些著作里，好奇的读者一定会对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引起充分的注意。他的母亲有点残疾，他主要是由仆人们照管的，他们不许他走出屋子。在总结这段早期生活时，他说，印度历史上的奴隶时代是不幸的，而他的这段生活也同样的不幸。“从我刚开始记事起，”他在另一个场合中说，“我就非常喜爱自然。”但在他的童年时代，他却被束缚在乔拉圣科的几间房子里，他向往外面的自然界，向想外面的人们。

罗宾德罗那特的教育开始得很早，他曾被送进各类学校。由于他在这些学校中毫无长进，十七岁时他被送往伦敦。在亨利·莫利教授的指导下，他在伦敦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说到

他的教育，他确实曾在加尔各答和伦敦大学念过书，但是他几乎完全是靠自学的。这种自学几乎在他开始做第一个拼写练习时就开始了。凡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在学习了字母以后，接着就学习构词法，那包括字母的变换和组合。在象其他的初学者一样，通过一本普通的初级课本，费劲地学习了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以后，一天他偶然想到了一句诗，这句诗可被翻译如下：“天下雨了，树叶在颤抖。”他发觉这些单词被一种意义上内在的一致性联系了起来，它们使他产生一种雨声淅沥，树叶抖索的幻觉。这一发现突然给了他一种新的启示，这种启示在他以后的著作里经常被提到。这位后来将在他的著作里阐述统一与和谐之课题的诗人，当想到在“天下雨了，树叶在颤抖”的诗句中将单词联系起来的那个中心意思时，竟象孩子似地被感动了。这样，一堂语言基础课居然成了他借以探索一种他生命之最深刻的真理的入门向导。\*

谈到他在加尔各答的学历，诗人毫不掩饰他的厌恶情绪，他只是对他的一位老师——伦敦的亨利·莫利教授表示了真正的敬意。他将学校比做工厂，将他在那儿度过的生活描写得简直象安达曼群岛上的苦役。大哲的第三个儿子海明德罗那特（1844—1884），负责罗宾德罗那特和其它两个孩子的教育工作，他为培养罗宾德罗那特和其它受他监护的孩子作了精心的安排。他让他们学习各种课程——科学，文学，音乐和绘画，将这些课程大量地向他们灌输。后来诗人承认那时所学的大部分知识都被他丢失了，他把自己比成一条漏船或是一

---

\* 见《人的宗教》第95—96页。在《我的回忆》（第4页）中，诗人强调了这句诗的韵律美，称它为第一流诗人的第一首诗。

家倒闭的企业。但是关于海明德罗那特对他的教育，有一件事是必须提及的。当时孟加拉有一种习惯——现在也还是这样——几乎在孩子们一开始学习孟加拉的初级课程时就教他们英语，直到现在英语仍是讲授历史、地理、数学和各门科学的中介。海明德罗那特对这种习惯是非常反对的；他要用孟加拉语来教授他所监护的学生，一直到学完各门高级的课程。他要用孟加拉语来作为教授各门科学和其它课程的语言，然后才让他们学习英语。当然即使罗宾德罗那特没有早期的这种良好的孟加拉语的底子，他还是具有一切可能成为他今天这样伟大的诗人。但是在那将英语放在首位的日子里，对于本国语言的强调必定对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性格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自尊心。

#### 4

一八七八年罗宾德罗那特前往英国，一八八〇年回国。一八八一年，为了学习法律，他又前往英国，但后来改变了计划，从马德拉斯回国。家庭不想再让他学习了，而且他同时已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的相当大的才华。一八八二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夜之歌》的诗集，出版不久，他就获得了热烈的赞扬。在雷米施齐德拉·戴泰的长女的婚礼上，贝金齐德拉把他赞为文艺太空中初升的太阳。对诗人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哥哥乔蒂林德罗那特（1848—1925）及其妻子。乔蒂林德罗那特本人是个对什么都敢于尝试一下的人。他进行一项新的商业冒险就象谱

一首新的曲子一样随便，他要他的妻子取消帷帘<sup>①</sup> 就象为孟加拉的绅士们设计一件新衣服一样容易。在他和罗宾德罗那特的相处中，他不允许年龄的差异在他们之间产生任何障碍；相反，他鼓励比他至少年轻十二岁的弟弟象他一样去思考，去感觉。“我的哥哥乔蒂林德罗那特，”诗人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毫无限制地让我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自我感觉。”和这个毫不循规蹈距，又反对别人循规蹈距的人相处在一起，使得诗人克服了那种习染极深的自卑感和羞怯心理。乔蒂林德罗那特的妻子对罗宾德罗那特的影响甚至比她的丈夫还深刻。可以认为她正是罗宾德罗那特这个后来在全世界得到无数赞慕者和信徒的诗人的最有益的朋友。一八七五年，当诗人的母亲逝世以后，她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在她的少女娱乐活动中，她让他做游戏的伙伴。当罗宾德罗那特成长为诗人后，她又是和他志趣相同的人，并且是他的第一个有见识的评论者。她是个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曾向罗宾德罗那特指出——许多人到后来才认识到的——维哈里莱尔·查克拉瓦蒂的诗集中的独到之处。她对于罗宾德罗那特所写的一切作品都要仔细地审阅，使他免除了文艺家们常常容易产生的弊病——虚荣和缺乏自我批评。一八八四年，这位夫人去世了。她的去世使诗人懂得了死，它在他的心中留下了经久不灭的印象。“它的打击，”诗人说，“在每次失去亲人以后，随着流不尽的眼泪变得越来越惨重了。”乔蒂林德罗那特妻子的形象，通过诗人想象的改造，在他的一些最优秀的诗歌和小说中得到了再现。

乔蒂林德罗那特和他的妻子对罗宾德罗那特早期生活的影

---

① 印度妇女为了不让陌生人看见而挂的一种帘子。——编者注

响是那样的深广，以至有一次当这一对夫妇离家作一次长期旅行时，诗人感到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了，于是他便从他们施加于他的风格中解放了出来。由此可见，造就一位诗人的最深刻的影响，还是诗人自己。

关于文学方面的影响，必须提到维哈里莱尔·查克拉瓦蒂。他没被公认为重要的诗人，但是罗宾德罗那特和他的嫂嫂却在他身上看到了真正的抒情诗人的灵感。维哈里莱尔在韵律方面的尝试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可能还帮助他形成了杰范——德瓦塔的概念。更重要的影响是毗湿摩的抒情诗，那些诗以其强烈的感情、大胆的想象与自由地运用韵律而别具一格。关于罗宾德罗那特与毗湿摩诗人们在生活观上的相同之处将在后面讨论。这儿，仅仅这些“充满自由和大胆的表现精神”的诗篇在青年诗人身上所激发起来的力量，这种给他勇气，使他得以在文艺和诗歌的原野上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的力量，已经足够吸引人们的注意了。\*

## 5

罗宾德罗那特一生写了多少诗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的第一次作诗的尝试始于一八六八年，那时他几乎还不满七岁。但是

\* 谈谈其它的各种因素，只要是在诗人成长的过程中对他发生过影响的，将会是非常有益的。关于他的老师们，已经提到亨利·莫利教授，诗人是怀着极大的热情谈到他的。诗人曾与他一起研究了托马斯·布朗先生。在《雷利乔·麦第奇》和《尤伦·伯里尔》中，不难发现罗宾德罗那特对于死亡的看法中具有布朗对于同一问题的奇特见解的影子。

关于他早期的尝试，他后来认为，所有那些在《夜之歌》之前的作品都应该是否定的，只有那本曾受到贝金齐德拉赞美的诗集才真正标志着他的诗人生涯的开始。但是即使是这本书，也还是在那种使他对整个宇宙有了一种新的看法的伟大启示产生之前写成的。

这种启示到底是什么，它是何时何处产生的？在《人的宗教》中，诗人说这是他十八岁时在加尔各答产生的（第93——94页），但他十八岁时正在英国。一次在中国的演讲中，他说它产生于一个乡村，但在《我的回忆》中他又说是产生于加尔各答。起先，在乔拉圣科的小屋里，这种启示只是朦胧的，后来到了苏德街，它就变得清晰而强烈了。但是尽管诗人是在苏德街（1882）才充分意识到一种新的感情，并将它表述在《瀑布的觉醒》这首令人难忘的诗篇里，但在其充分显现之前是会有模糊的颤动的，很可能这种最初的萌动早在他离开英国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假使我们记住了这些情况，那末上述种种彼此矛盾的说法就决不会引起混乱了。这种最终表述在《瀑布的觉醒》中的感受其实质又是什么呢？

在上面提到的一次在中国的讲演中，他谈了他在一个乡村所得到的感受：

“我的经验的世界似乎豁然开朗了，那些以前彼此分离的，朦胧模糊的事实，形成了一种意义上的伟大整体。”一天晚上，在乔拉圣科的小屋里——“落日的余辉伴和着一种暗淡的暮色，似乎要使这正在降临的夜晚对我产生一种特别美妙的魅力……我诧异了，难道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平凡帷幕的揭除，也要归因暮色的魔力吗？不。”（《我的回忆》）

关于他在苏德街的感受，他曾在各类文章中写到过。以下